

日惹几日几人

曾嘉慧

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，研究国家为印度尼西亚

2019年在日惹的日子，很像抽刀断水，又快又慢。

一、“这个酒店有游泳池吗？”

当时，我唯一的主日程是在城市偏北的一个私立语言学校上语言课，用英文教学，价格不菲。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，每天只上得起一堂课，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课多在一个半小时内结束。语言学校最大客户是澳大利亚人，他们或来为NGO工作、或来做生意、或来做研究。我之前对他们并不太在意，因为上课是一对一的形式，我完全不需要和任何人社交。直到进行到第二本书的中段，当我被迫花了两天时间来学习如何订酒店、订机票、订火车票时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和老师Andi抱怨道：“为什么我要学这个？订酒店订十分钟，这是什么高档酒店？我根本用不到。你们不是都用traveloka吗？”Andi大笑：“我也用不到！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说过话！”我这才意识到这个课本的荒谬——

“这个酒店有游泳池吗？”

“有的，先生，我们有一个很宽敞的游泳池。”

毫无疑问，课本对学生的预设——有钱、喜欢旅游、注重酒店游泳的质量，比起穷亚洲学生，更贴合这一预设的当然是眼前晃来晃去的澳大利亚白人。不过他们真能用到多少呢？或者这也是印尼老师的想象呢？我无从考究课本的编写过程，但无论如何，这节课之后，我们决定远离课本规定的习练轨道，多谈些日常生活中的事情。

和 Andi 谈生活中的事情当然应该用印尼语，可经常是想问很多，词汇太少，最后总不知不觉地滑到了英语。Andi 是日惹的伊斯兰大学 (Universitas Islam Indonesia) 毕业的，他没出过国，但英文非常好。有一次我们学到 bangun(起床)，他顺口问我每天几点起床几点睡觉。印尼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，爪哇岛上清真寺的密度很高，平均一公里至少有一个，清真寺广播是城市里最基本的音轨之一。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很害怕 Fajr (晨礼) 的唤拜声，经常到了四点就很惶恐，心里暗暗和 Fajr 比赛，要比它先沉入睡眠，一旦听到 Fajr，那就是我又浪费一天的警钟。”他大笑，说那就是他起床的时间，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，每天五次礼拜，他这辈子一次都没缺过 (我不太信)，Fajr 后再回去小睡一会儿，晚上十点一定睡觉。

我慢慢潜入日惹的特殊性，这座只有不到五十万常驻人口的小城，是全国最重要的思想引擎。它有将近 60 所大学，包括频出政界精英的 Gajah Mada 大学，印尼最大的艺术院校 ISI 等。日惹以“学生城市”(kota pelajar) 闻名全国，从房租到食物，都在印尼名列前茅地便宜。这座城市在思想上也格外活跃，代表着“现代”的进步主义、自由主义、世俗主义都在这里繁荣。城市里鲜有摩天大楼，中产阶级式的文书工作较少，因此选择留在日惹工作的毕业生，某种程度上

也意味着选择暂不加入城市中产的快车道。日惹物价虽低，但丝毫不让人觉得匮乏或贫穷。它的街头自带顽皮，紧密的友谊和高度的互相信任，可以让人们以很低的经济成本在这里学习、工作和创作，以交友为主的社会网络负担着社会的大量中介任务。另外，日惹也是隐形的伊斯兰重镇，伊斯兰的光谱在这里也出奇地丰富。日惹既是印尼第二大伊斯兰组织、改革派 Muhammadiyah 的总部，也是印尼瓦哈比中枢 Al-Mukmin 学校的所在地。

课程快结束时，我冷不丁问 Andi 怎么看待同性恋和（施行伊斯兰教法的）亚齐特区。他狡黠一笑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他肯定被喜欢游泳池的学生问过多次了。果然，他给了我一个日惹穆斯林无可挑剔的答案：“我不支持沙里亚治国。我有很多朋友是同性恋，他们有权利在这个国家正常地生活下去。”

二、“L，我可以摘那个芒果吗？”

每天下午五点半的 Maghrib（昏礼）是我一天中最爱的时刻。一整日爪哇明亮干燥的阳光接近烧完，天色由红转黑，赤道的落日总是非常准时，六点十五分，天会全黑。人力车、摩托车的很多司机都忽然一下在街上消失了，他们在软件上转入下线，随机开进最邻近的清真寺，完成功课。一旦有机会，我都会站在家附近的 Kali Code 河边体会这一时刻。这条河几



图 1 Kali Code 河 作者拍摄

近是我见过最浅的河，河石常露出水面，河水急促，遇上河石总要喘粗气。入夜多少令人遗憾，光的消逝总暗示着某种恒久的逝去，是我长期觉得困难的时刻，但四下无人，被清真寺的唤拜、河水的粗气、远处摩托的喇叭声和食物小贩的叫卖声围绕时，无光的夜晚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。

几个中午，我和声音艺术家好友 L 去 Kali Code 河边吃饭，他找到一家聪明的餐馆，把餐桌嵌入了 Kali Code 的堤坝。河边的午饭促人沉思，我们聊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。L 在雅加达长大，有一点华人血统，1998 年排华时，曾被父母送到朋友家避难——绝大部分华人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。他曾在美国留学，因为名字太穆斯林，经常无缘无故被警察上门突袭，他不堪其扰，没读多久就回国了。我们没有聊过这一段，但他英语非常好，写邮件时常常蹦出诗意，可能是他那段生活的痕迹。

有一天，我和 L 说起室友 Rugun 收到父母寄来的雅加达家里的芒果。“Rugun 是这么跟我说的，jia，你尝尝这个芒果，雅加达来的。我很困惑，雅加达还产芒果？结果她说，哦不，这是我家院子里的！我妈妈种的。我家院子里有两棵，如果我和哥哥不在家，她就会成熟前几天摘好，算好日期寄给我们。天呐，我羡慕坏了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希望自己有产的一天！”

他大笑，说他们家曾经有更多，芒果树是爪哇家居的标配，可能就像你们有洗衣机一样。这半是说笑，但种植（home garden, pekarangan）的确是爪哇人对于“家”的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归属一定程度上可以跨越阶级，中产阶级种在自己的院子里，贫民区也有街头的公共花园，种类异常丰富，比如在西爪哇万丹的两个邻近街区可以找到 179 种植物。

也因如此，在大城市，将人们从水平的房子挪到垂直的公寓出奇地难，比如在雅加达重建贫民窟，有心的建筑师需要考虑留出大量的公共绿地，供人们种植。绿地是用来种植的，不是“风景”，这和我在中国的经验迥然不同。在国内的城市，“青青小草，也是一条生命”，意味着你和自然的关系邻近却森严，可远观不可亵玩，绿色是现代城市“文明、卫生、干净”的花边。我没来得及细察 pekarangan 的社会根源，但猜想有两个可能的来历，一个是农业国家的种植传统；二是经济极不稳定。1998 年的金融危机，印尼受创最重，全国近一半人沦为贫困，因为印尼盾价值跳水至 1/3（最低时只等同于 98 年前的 1/6），平民百姓的存款大幅度贬值，一度陷入贫困。即使过去二十年，对正式经济的不信任从未改变过，因此某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实践一定是人们的备选。

从此以后，我开始留意路边的种植。日惹鲜有裁剪整齐的公共园艺，但是细看这些杂乱无章的植物，似乎都是有效用的。我和 L 吃完午饭，从河边走向工作室，一株庞大的芒果树伸出了院落，比我手掌大的芒果高垂在人行道上。

“L，我可以摘那个芒果吗？”

“不可以，这是别人家的。”

下次我给你带两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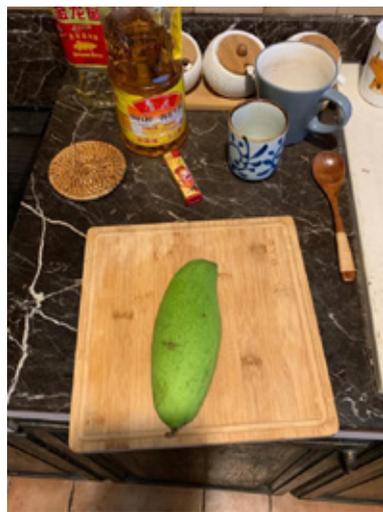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L 给我的芒果，被我带回了北京
作者拍摄

三、“我们可以结婚吗？”

Nita 是我在语言学校的另一位老师，日惹人。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她极少闲聊，在课堂的间歇，如果我们无话可说，她会干脆沉默，毫不在意沉默带来的尴尬。这种坚决暗示了一种分明的性格——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Nita 皮肤较黑，双眸深邃，她的少话与灵动更显出内心的敏感。打开她话匣子的契机很特殊，有一天我忽然提起，我住的房子有鬼。好几次近午夜时分，我在房子一层工作，室友们都不在家，小狗 teguh 趴在我身边。一片阒寂时，teguh 会忽然在屋里四处巡视，吼上两声。楼上时不时还会有些奇特的动静。

Nita 问我：“你怯 (takut) 吗？”我倒不太害怕，毕竟鬼也是一种社会关系，如果真遇到了，我是彻底的外来者，和它没有世仇。再说了，中爪哇的鬼不会说英文，我肯定听不懂它们说的爪哇话，沟通不畅，应该不会吃掉我吧。Nita 笑说，在这里，鬼无处不在。你看我们上课的地方，这层的厕所，那个转角，都有人撞过鬼。爪哇的房子层高，天花板拱起，鬼喜欢在高处，你去 joglo（一种爪哇传统的房子，屋顶高耸），顶就是鬼休息的地方。她说这话时，赤道的阳光正均匀地洒满窗外，香蕉树沉甸甸地下垂，街边小餐店上的炸物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没有一个角落不是光亮的。她用 ghosts, spirits, pocong，还有其他我没记住的爪哇词来形容鬼。一想到鬼和我们栖居在一起，不知何故，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，甚至令人安慰。

借着我们与鬼的友谊，Nita 终于讲述了她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十分普通，却最令人心碎。她今年 29 岁了，还没结婚，在爪哇已是严重的晚婚，会为邻居侧目。她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在他们的教堂是受人尊敬的长者，她自然也是

基督徒。但宗教对她来说，现在除了是规训和障碍，别的什么都不是。她有一个很相爱的男友，他们是大学同学，刚刚恋爱一年多，感情深厚。这段感情对于她曾经是甜蜜多于折磨，现在是折磨远甚甜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男友是个虔诚的穆斯林。她男友来自中爪哇某村落，家里是当地望族，世代经营 pesantren (pesantren 是主要分布在爪哇岛上的伊斯兰经学寄宿学校，往往是爪哇乡村宗教生活的中心，偏传统伊斯兰。现在受宗教事务部认可、采纳宗教事务部课程建议的 pesantren 一般会在课程设置上实行三七开，三分宗教课程，七分普通课程。因为一般不收学费，因此是农村和城市贫民阶层的主要教育选择)，母亲是校长。寄宿学校规模颇大，学生上千人，大部分是从远近的村落赶来上学的学生。大学毕业后，男友完全有能力去雅加达或其他大城市谋生，但被母亲召回了村里，现在是 pesantren 的老师。因为学校的周期，他通常一到两个月才有一次休息的机会，村子离日惹不远，大概 200 多公里，但是汽车转火车，来日惹一趟也得六小时余。因此，大部分时间，Nita 在这个城市形单影，她独自来上课，下班后独自回家，少有社交。

“你们考虑结婚吗？”我问。跨宗教结婚 (Interfaith marriage) 在印尼世俗法律上存在操作空间。不过，长久以来，婚姻远不只是世俗法律的领域。1974 年婚姻法将球踢给了个人，“只要婚姻符合双方宗教和信仰，即为有效”，偏保守的宗教领袖就依此认为伊斯兰跨宗教婚姻不合法，MUI (印尼伊斯兰宗教学者理事会) 还曾就此发过 fatwa (教令)。对立志结婚的跨宗教伴侣来说，选项不太多，需要海量的街头智慧和坚定的意志，比如更换身份证的假装归信，经济较好的可以去国外登记，香港和新加坡都是首选。我身边也有在开明的家庭氛围中大大方方结婚的案例。

“我们可以结婚吗？”她反问我。

我愣住了。

“他们家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宗教首领，不可能娶非穆斯林。”

“你考虑归信吗？”

“我可以接受……但是父亲……他身体不好，我不可能在他在世的时候改宗。父亲的病是慢病。”

作为女性，Nita 担心的不只是这段感情，还有自己的婚姻机会，毕竟家庭、社区、村落的舆论，都在反对这桩结合。两个月见三四天的周期，听起来也不可持续。“我也见过他妈妈，她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她看起来很友好，我们见完之后甚至还会发短信问候，天气冷了还会叫我添衣。但她从头到尾，一字都没提过我们结婚的事。这对她来说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因为，问题根本不存在，我们不可能结婚。”

“如果你们真的结婚了，你们要住在哪里？”

“这也是问题，他要我去 pesantren 做英语老师……因为他不可能离开那里。那是他的家族事业，以及比事业更大的东西。”

“啊！Nita，你爱他吗？”这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，问完我就后悔了。她那么聪敏，知道这个问题等于，“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放弃？”

“你别问我了，我每天都问自己。现在的问题也许已经不是我爱他吗，而是……我可以吗？”

没有一关是易过的。把头埋着或者把头别过去，关都不会过去，只有时间会过去。这次的谈话没有后续。Nita 仍

然给我上课，但之后的课上，我觉得她在有意减少任何我对她私人生活提问的机会。我和她年龄相仿，没有结婚，也面临婚姻机会和家庭压力，但我们的“难”不在一个层级，也并不互通。Nita 下课后就离开学校，绝不多逗留，这里熙熙攘攘的白色的、黄色的、执迷于游泳的学生，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。她的兴趣在中爪哇的某个村庄，一个有女校长的 pesantren 里。对于那里，出生在日惹基督教社区的她可能和我一样外来，也是“鬼都懒得吃的人”。按面积说，中爪哇不大，但它又大得无边，众神的手在这里交叠，缠绕和庆祝。凡人的身体，是最可贵的，又是最可弃的。

注：此文献给他们和 yifei，是她最早促我动笔。近一年过去了，它来晚了，yifei。

本篇责编 李音 文字校审 董慧